曲　枫　主编
〔德〕迈克尔·克努佩尔　副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Arctic Studi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曲　枫　主编
〔德〕迈克尔·克努佩尔　副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Arctic Studi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环境史与考古学

18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初丹麦帝国捕鱼、捕猎海豹和捕鲸业
——欧洲方式与丹麦本土方式的冲突与交融
……〔爱尔兰〕保尔·霍尔姆 / 3
亚马尔北极和亚北极地区考古研究……〔俄〕H. B. 费奥多洛娃 / 34

西伯利亚研究

默克收集的雅库特资料及其历史词典学意义
……〔德〕迈克尔·克努佩尔 / 47
博戈拉兹的楚克奇人调查研究 …… 张　松 / 52
乌尔奇人的熊崇拜和熊节
……〔苏〕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佐洛塔廖夫 / 74

中国近北极研究

中国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比较研究 …… 苏　杭 / 89
历史上鄂伦春族与外界经济、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关系色彩 …… 何　群 / 105
中国近北极民族北方通古斯人及其文化变迁 …… 唐　戈 / 122
边缘社区与多面认同：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族群及文化认同研究
…… 马惠娟 / 128
改革开放 40 年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的积累与利用 …… 金　洁 / 14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旅游与地区发展学

加拿大北极地区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 潘 敏 李浩涵 / 153

Experiencing the Arctic: European and Chinese tourists in Greenland

…… Daniela Tommasini, Zhou Shenghan / 170

人口较少民族如何发展

——以鄂伦春自治旗为例 …… 刘晓春 / 186

学术动态

美国斯密森学会北冰洋研究中心走过的风雨 30 年：1988～2018 年

……〔美〕威廉·费茨休 / 197

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ASC） …… / 202

征稿启事 …… / 204

Call for Submissions …… / 20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边缘社区与多面认同：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族群及文化认同研究*

„>- ： X ｏ T ｏ ， ά Ë 56 T
。X ╜ e å ﾍ ｏ ω ， X ｏ ƃ ᆨ Ë ɔ
。 ã Ę e ภ ， h X
ש ɔ ⅞。 ω i Ẋ δ T ， x
ỷ Љ X 。
δ ， ǖ Ẋ \l Ὸ ， h T
ɔ 、 、ķ ωש ц ȁ ǖ ă ，
ϲ ˜ ǻ ɯ ȁ 。
ŸJZ@ ù Ẋ ⅞ ɔ e ภ
ˆ510¬ ÷ ： ，╥ Ч 。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政府通过民族识别确立了 56 个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政策发展，形成 56 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近年来，随着日益卷入全球化浪潮，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如何进行自我调适，他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No. 30919013210。

的认同感发生怎样的转变，对此中国学术界缺乏足够的关注。本研究以使鹿鄂温克人为个案，把当今小民族的生存状况置于宏大的政治经济语境中进行考察，以期能回答上述问题。

使鹿鄂温克是鄂温克族的一部分，人口始终在一二百人上下。他们在大兴安岭深处以狩猎和放养驯鹿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始终保持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扶持。2003 年，使鹿鄂温克的生态移民将这支不足两百人的族群带到了镜头前，使他们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应该说，政府对使鹿鄂温克的几次定居努力，也是这一族群逐渐增多与外界接触和交流的过程；2003 年的生态移民可以算作一次加速，其居住地由森林深处迁至城市边缘，互动范围由社区内部扩大到与城市居民、更多族群、研究者和旅游者等之间的频繁互动。在文化交流和利益冲突当中，使鹿鄂温克的族群意识逐步强化，血缘关系更加被强调，地域认同意识发生了拆解、重组等一系列演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在矛盾与融合中发展。使鹿鄂温克拥有多重身份认同，在特定的时间和情境下，一种身份被强调；而在另一时间和情境当中，这种身份却可能被有选择地忽视，展示出对另一身份的认同。这些身份认同并不是对立和割裂的，而是像棱镜的多个侧面，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族群认同不再是平面的界限划分，而呈现出多面的立体的样态。对不同情境下的多面认同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小族群在社会变迁和多族群交流情境下的能动性和自我定位，也可以深入探知多方面外在因素对小族群自我认同产生的影响。

“ ” “ ”

“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在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讨论中被视为族群性的核心问题，主要被用来讨论族群认同及辨异情感的产生和演化过程。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以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范·登·伯格（Pierre L. Van den Berghe）为代表的原生论（Primordialism），二是以库恩（Abner Cohen）、巴拉斯（Paul Brass）等人为代表的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原生论“就是研究主体的认同表达”[1]，关注族群成员主观的认同因素和对文化特征的解释，认为族群的文化特征是先天的，由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① 范可：《文化多样性及其挑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

缘、语言、宗教等先在的内部特质决定。工具论者更为关注的是族群认同产生的社会动因，认为认同是族群成员根据场景变迁做出的理性选择，族群认同源于对稀缺资源的追求，为获取切实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利益服务。原生论和工具论之间并非对立，二者强调的是族群认同的不同侧面，原生论侧重于族群内部文化传承，工具论侧重于族群认同动态的维系与变迁。凯斯（Charles Keyes）将原生论和工具论进行了统合，认为族群认同与共同祖先等原生性因素有密切关系，但这些因素只为认同提供了可能性，群体成员想获得特定工具性利益时，对原生性因素做出选择性阐释，这时族群认同才会产生；族群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会环境变迁的条件下，特别是发生移民等激烈的政治—经济变动时，会产生新的认同，或者人们会赋予旧有认同以新意义。

以上人类学家的族群认同理论为笔者的资料梳理与理论讨论提供了洞见。为了明确鄂温克人群体认同与周遭自然与社会环境和国家政治语境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对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历史做一简要的梳理，然后再进一步考察他们的认同表达是如何在特定的文化、社会与政治语境里得到体现与变化。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现有鄂温克30875人，由于历史、分布地域、自然环境等因素影响，他们有着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鄂温克人可以分为三个支系：被称为“索伦”的鄂温克，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扎兰屯市以及黑龙江讷河市等地，从事游牧业和定居狩猎及农业；被称为“通古斯”的鄂温克，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自治旗锡尼河流域、陈巴尔虎旗等地，从事畜牧业；被称为“雅库特”的鄂温克，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从事游猎和驯鹿放养。“雅库特”鄂温克便是本次调查的主要对象，本文采用该族群认可的族称“使鹿鄂温克”。

使鹿鄂温克人的传说认为，人类起源于勒拿河一带的拉马湖。列那河时代的鄂温克人一共有十二个氏族、十二个萨满。根据吕光天等人在1957年进行的民族调查：从列那河迁来中国的使鹿鄂温克是一个大部落，有一个最高的部落酋长（基那斯）；大部落下包括四个大氏族，每一氏族有自己的氏族长（基那斯）；而每一氏族下面又分成若干“乌力楞”，每个“乌力楞”有自己的族长（新玛玛楞）。“乌力楞”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单位，一个“乌力楞”由五六个到十一二个数量不等的撮罗子（鄂温克人居住的房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组成。使鹿鄂温克最后一位基那斯于1761年去世，从此部落解体，各氏族成为独立的社会单位和生产单位：每一氏族占据一条大河游猎，氏族所属的不同“乌力楞”占据大河之间的不同支流；在通婚上实行氏族外婚制，氏族内部禁止通婚。长久以来，通婚造成的人员流动使得氏族逐渐解体，“乌力楞”演生为独立的社会单元。到1957年民族调查前后，使鹿鄂温克共有五个“乌力楞”，每个“乌力楞”在专属范围内游猎；“乌力楞”成为通婚的独立单位，血缘关系很远的氏族分支之间可以通婚。①

由部落到氏族再到“乌力楞”的解体组合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这样的决定因素——血缘、亲缘和地缘。氏族由具有共同世系的成员组成，“乌力楞”是由血缘和亲缘关系结成的家族公社，而不同氏族或者“乌力楞”之间又以游猎区域，即“千”，作为区别标识。

不同游猎区域的群体间并非相互隔绝，他们定期聚会和相互拜访，除了探亲和互赠礼物之外，也为了促成青年男女结成婚姻。这一时期使鹿鄂温克的血缘、亲缘与地缘认同，是静态的、命定的、非选择性的，强调群体内部在共同生活或共同经济利益基础上的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和群体凝聚力，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主要基于直接的血缘、亲缘关系。

（ ）

族群认同产生于同“非我族类”的他族接触、互动之时，生产、生活迥异的异族，为建构和巩固“本族”提供了参考，也是维系本族内部凝聚的重要动力。使鹿鄂温克并非生活在文化孤岛之上，与他族的交往一直存在，其族群意识伴随同外界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增加而有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

17世纪之前，贝加尔湖地区一直在中国统辖范围内，使鹿鄂温克的先祖便生活在此。唐朝时，这一族群被称作“鞠”，鞠部落在贞观至永徽年间（627～655）曾一再“奉貂马入朝”②。后来的辽、金、元、明、清政府也都

①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第187～190，208～222，522页。

② 吕光天、古清尧：《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102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与其存有贡赋关系。至17世纪40年代，因受沙俄侵扰，使鹿鄂温克迁离贝加尔湖地区，迁入额尔古纳河流域。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以额尔古纳河为两国东段边境分界线，清政府于1908年始派赵春芳对使鹿部进行调查并对其进行管理。在这之间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使鹿鄂温克受俄国影响较大，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讲俄语，取俄语名字，烤制俄式“列巴”（面包），其婚丧仪式中也有东正教的影子。国界不严格时，很多俄国商人深入到使鹿鄂温克生活地区，用一些生活生产必需品交换猎民获取的皮张、药材。但那时使鹿鄂温克并没有强烈的国属意识：“鄂伦春人①向未知属于中国。亦不能使之深解。”“问以何时归化俄国，是否长住此处，则以不知对，亦谓不日移居他处。”②

鄂伦春人与使鹿鄂温克人同是大兴安岭的狩猎者，在生产生活、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等很多方面十分相似。史料里两者分别被称为使马鄂伦春和使鹿鄂伦春，或者统称为鄂伦春。俄国人类学者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于20世纪初对这两个族群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把两者归为北方通古斯的不同集团，两个集团间是相互贬斥的关系：鄂伦春认为使鹿鄂温克是不值得相信的，是低劣的族群；使鹿鄂温克自认为优越于其他以“鄂温克”自称的族群，并认为鄂伦春是低劣的，鄙弃其偷马行为和“粗野的举止”③。史禄国也指出，双方虽言语上相互排斥，但并不一定带来紧张关系，他们对对方的贬斥中有夸张成分，两者在中立地域相遇时也往往不发生冲突。在使鹿鄂温克老人的记忆里，如果在狩猎途中与鄂伦春人相遇，他们相互会分给对方自己打到的猎物。

该阶段使鹿鄂温克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原生性族群认同，是在族群互动过程当中，通过对祖源和文化特征的阐释，实现给自己和他人分类的目的。族群理论认为族群认同表达在现代社会主要是一种政治现象，民族国家的叙述话语直接影响族群的认同与阐释。民族识别政策对中国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及各个民族之下各族群的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① 使鹿鄂温克在史料记载中，往往被与鄂伦春混淆，此处的“鄂伦春”便是对使鹿鄂温克的误称。

② 中东铁路局编《黑龙江》，商务印书馆，1933，第746～753页。

③ 〔俄〕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154～161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费孝通认为，族群或者民族称谓，有一个从“他称”转为“自称”，从“民间”称谓到“官方”正式命名的演变过程。[①]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就是一次民间与官方就族称问题而进行的大规模互动，由此在中国重新建立起了一个“民族身份”与族群关系制度性的整体框架。

“民族意愿”是鄂温克族命名的主要原则。鄂温克族三个支系在历代官方记载中分别有过多个不同的族称，但他们对自己族群的自称是“鄂温克”。1955年，呼伦贝尔盟召开鄂温克三部分代表座谈会，对统一族称问题进行讨论。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索伦、通古斯、雅库特民族统一名称和推行区域自治问题的决定》中做出这样的决定：“索伦、通古斯、雅库特民族统一为鄂温克民族问题，是这几个民族内部的事，无须政府批准。只要这几个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及其领袖人物同意，不致因统一名称而引起民族间不团结，可由这几个民族的代表性人物的座谈会讨论决定。”[②] 根据这一决定，呼伦贝尔盟再次召开座谈会，有9名“索伦族”、3名“雅库特族”、2名“通古斯族”、4名鄂伦春族代表参加，统一协商之后，将“索伦”“通古斯”“雅库特”三个部分统一成为“鄂温克族”。内蒙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鄂温克分组分别于1956年5～7月和1960年8～9月深入奇乾地区对使鹿鄂温克进行了社会历史调查。这两次调查为鄂温克族统一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成为后期鄂温克族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民间意愿表达成为官方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依据，而官方的民族志材料又反过来巩固了这一民族认同。民族史志与口头传承相互调适共同构建并巩固了鄂温克民族认同。民族识别工作帮助少数族群将原本模糊的族群边界明晰化，在民族认同的框架下，特定文化要素被选择出来，作为我群认同及区分他族的标准。对于自身文化与鄂伦春族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使鹿鄂温克持强烈否定态度，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们跟鄂伦春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养马的，我们是养鹿的”，“我们是从俄罗斯那边过来的，鄂伦春不是”。而鄂温克族的另外两个分支，使鹿鄂温克则持有比较强的认同感，认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②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党委关于索伦、通古斯、雅库特民族统一名称和推行区域自治问题的决定》，1957年3月8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为三分支间虽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但这是历史上多种因素造成的，他们都是“鄂温克族”这一点不容怀疑。一个热衷研究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使鹿鄂温克长者告诉我：“我们原来都是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区，他们比我们更早迁到这边来，跟当地的汉族、蒙古族接触时间比较长，受他们（汉族、蒙古族）影响比较大，慢慢地就被同化，生活方式跟他们（汉族、蒙古族）很像了……我们（使鹿鄂温克）是三百年前才迁到大兴安岭地区，驯鹿一直没有丢。”

“原生论”认为族群性建立在确信具有共同来源的基础之上。这里所指的共同来源，是在主观上共同认定具有同一祖源，此祖源并非要求客观的共同血缘，可以是社会建构的存在。在同宗同源认同的前提下，语言、宗教、地域、仪式等方面的差异再被有选择地拿来作为族际区分的进一步标识。

( ) “ ”

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与进步是我们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偏远边远地区，扶持少数民族进步发展，就成为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对鄂温克族的发展，政府同样做了安排，这是一种如费孝通所谓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影响了鄂温克人日后的认同建构与表达。

Æ q : ý •

按照社会进化图式，游猎部落是最为原始的社会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使鹿鄂温克正是处于这样的原始社会末期。狩猎采集、居无定所的原始生产生活方式需要在有计划的引导下逐步发展。定居是第一步，现代化是第二步。

1949 年 10 月，就在使鹿鄂温克的主要游猎区域额尔古纳旗建立了奇乾供销社；此后逐步为使鹿鄂温克购买住房，并于 1957 年成立了奇乾鄂温克民族乡。只是当时下山定居的猎民很少，主要是政府工作人员。到了 60 年代，由于地理环境问题及中苏关系问题，使鹿鄂温克的游猎范围逐渐向东迁移。至 1965 年，奇乾鄂温克民族乡迁至满归，成立满归鄂温克民族乡（1973 年改为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政府在密林深处的敖鲁古雅为使鹿鄂温克新建 35 户“木刻楞”住房，使鹿鄂温克 35 户、113 人入住新居，实现了全部定居。第三次定居实践发生在 2003 年 8 月，使鹿鄂温克进行了整体生态移民，集体搬迁到根河西郊三车间处的新乡址。新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